



訪問楊慶球牧師

引言：

文更 2012 年出版的《中國文化處境的神學反思：中華福音神學人物研究》已納入是次訪者，介紹他為「華人基督教界罕有的通識通才型人物，集作家、教授、教牧三職於一身」（212 頁），繼後他退休逾十年，三職於一身依然，今有幸來一次「集大成」專訪。楊慶球牧師／博士，論其作，具特色的如《俗世尋真：基督教與現代哲學》、《中國文化新視域：從基督教觀點看中國》、《民主與民本：洛克與黃宗羲的政治及宗教思想》、《成聖與自由：王陽明與西方基督教思想的比較》、《實在論神學：托倫斯的神學思想研究》等，可謂東西兼治；論其教，港加四校教授院長外還客座於中國人民大學、四川大學、蘭州大學、武漢大學及中山大學；論其牧，港加兩地為主任牧師多年外，再加各式義務性牧職。這些精彩故事，一一道出如下。

訪問者：徐濟時牧師（徐）

受訪者：楊慶球牧師（楊）

徐：很高興能在這裡向楊牧師您作深入訪問。正如以往的人物專訪皆是全面性、多面向的訪問，好讓讀者對受訪者有更好認識。我們就先請您談談，由童年成長至中學畢業一段日子、尤其是漸被人遺忘動盪的五、六十年代的成長故事。

楊：五零年正是香港多事之秋。戰後百廢待舉，大陸解放後難民湧進香港，沒有就業機會，民不聊生，先父在印尼出生，輾轉來到香港謀生，與先母結婚後生活一直貧困，我排行第三，大哥一家現今在加拿大渥太華居住，二姐則仍在香港。小時家貧失學，直至七歲始入讀幼稚園。當時政府為怕共產黨滲透新界區的學校，故把新界所有小學全納入政府的津貼網中，做成教育資源失衡，新界學位充裕而市區兒童失學。大哥十二歲被迫跟舅父工作。而我則晚上就讀義學，日間在街流蕩，幸得青年會兒童工作者照顧，加入兒童會。十一歲因讀書問題，遷往新界，自此有正常學習機會。

我少時對宗教很有興趣，在港島時曾返摩門教及基督教福音堂，對聖經故事頗熟悉，喜愛唱聖詩，更喜愛團契生活、主日學。1962 年搬往大埔後，有機會返禮賢會，深受弟兄姊妹愛的熏陶，並經三思比較後，毅然離開摩門教。返教會不久，認識不少弟兄姊妹，團契中以弟兄為多，姊妹很少，其中以麗薇、麗娟姊妹印象尤深。姊妹二人的熱心愛主，溫文嫻淑，都是受眾人稱許的，麗娟後來成為我的太太。我在小學六年級受洗。

因家貧無力赴市區升學，中學在大埔佛教大光中學就讀，原因是學費便宜且省回往市區的交通費。五年中學生活十分愉快。在升中學三年級時，上帝藉吳勇長老在港九培靈研經大會讓我看



見中國福音的需要，決心奉獻給主，麗娟也是同時奉獻。我自少有一份強烈愛國的心，十五歲便學會了唱三民主義、義勇軍進行曲、大海航行靠舵手及國際歌等。熱血青年多愛國，上帝轉化了愛國的熱情，由政治革命而到福音廣傳。

中國是一個謎，文革時每天看到青年上街，擁毛鬥爭、不知是非，以為中國會從此強大起來，寄予無限希望。但隨著左派在香港暴動，四處放置土製炸彈，無差別傷害市民，香港市民對共產黨的鬥爭既怕又厭，反而支持香港警察，希望市面儘快回復正常。英國政府得到中國政府默許，大量拘捕左派動亂人仕，香港很快回復平靜。

徐：您信主的整個歷程是如何的？有什麼人起著關鍵的作用？這些人帶給你怎樣的影響？

楊：我信主是漸進的，由八至十歲參加摩門教，同時也參加教會附近的福音堂主日學，學習了很多聖經知識。甚至想參加摩門教的洗禮。由於年紀太少，幸好家人反對作罷。十二歲搬到大埔居住，翌年因同學介紹，認識了禮賢會大埔堂，當時有一位劉德恆弟兄，好像大哥哥照顧新來的朋友，他非常熱心愛主，受他感染不少。另李志剛牧師當年在信義神學院唸神學，在大埔禮賢會實習，每星期教主日學，為我們一班初信的打好信仰基礎。李牧師是我的啟蒙老師，對我的信仰影響很大，他後來擔任禮賢會灣仔堂主任牧師，八十年代更歷任基督教聯會主席。師母原來是與先父同鄉，同屬堂兄妹輩，因此他是我姑丈輩。大埔禮賢會的堂主任區天賜牧師，是一代良牧，忠心牧養，後來我父母信主，也是因他的努力。

徐：你大學階段是在中文大學主修哲學，那個年代中大有好些「熱心」的基督徒同學（不少人後來在信仰上有更大發展）。可否請你談一下那些大學日子這一批同學是如何「擺上」而影響校園和社會，好激勵這一代基督徒的大學生。

楊：1972年我進入了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哲宗系主修哲學。正值學生運動高潮、中文合法化運動、保衛釣魚台、認識祖國、關心社會。學生報立場較左派報紙更激烈，校園貼滿大字報，言論一面倒。作為基督徒必須反思信仰與文化的關係，學生團契在 FES（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／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）領導下，積極面對挑戰，當時導師有陳喜謙、蘇雲英及錢北斗等，學生團契充滿時代氣息，每屆福音營都得到不少同學信主。由於家母長年心臟病，晚上需要親人照顧；我且住在大埔無法有大學宿位，失去很多參與學生活動的機會，直接減少大學生活的多姿多采。

哲學系很多人反對基督教，梁燕城是其中一名捍衛信仰的表表者，溫偉耀、盧龍光等都是同期的人，他們向同學見證基督教信仰是合理性的。由於學生要面對很多理性的衝擊，出版刊物亦偏重理性思辨，因此教會對學生團契抱著懷疑態度，認為不夠屬靈。一班熱血的基督徒大學生，在校園舉辦「天風知否神州路？」的大型活動，也定期為中國祈禱，可是一般教會並不支



持這些活動。他們不支持歸納為 1. 六七左派暴動平息不久，基督徒最好避談政治；2. 六十年代仍受西方保守派傳教士影響，他們無力面對哲學及科學的挑戰，發現很多基督徒讀了大學便離開教會，放棄信仰。教會採取逃避態度，主張河水不犯井水，信仰與學術分家。

上述三位同學在校園中，透過一些公開聚會，例如溫偉耀與李天命校園對話，力陳信仰合乎理性要求，而且力辯科學與信仰不矛盾，更可以闡釋信仰。在中文大學學生基督徒團契聚會，互相鼓勵閱讀護教書籍，例如史托德、薛華、潘霍華等。在每年主辦的福音營，基督徒同學積極備戰，帶領不少同學信主。

徐：您是如何走上讀神學之路？有否甚麼特別原因？誰人或教會怎樣影響您？楊牧谷牧師日後作為論文的指導老師又怎樣影響您？

楊：中學期間，曾有兄姊發起到木屋區派單張，一行四人至大窩口。當時暑期酷熱，區內年輕的多在外間工作，剩下老人及小孩。陽光熾烈，村內寂然無聲，老人昏昏欲睡，小孩沒精打采，死寂得叫人迷茫。我們以福音故事喚醒小孩子，給他們玩遊戲、派糖果，老人多不識字；我們逐家留下單張，心靈中伴著一張張枯黃的面孔而去。在我心中，就種下一生事主的心志，後來，在港九培靈研經大會決志奉獻，一生不改。會考過後，我第一次負起少年夏令營導師，對少年的福音工作非常熱心，營中看見一個一個幼嫩心靈決志信主，十分感恩。過了兩年，我有機會負責整個少年營，那次效果很好，一位從中國逃亡來港的姊妹作見證，感動很多人信主。

大學畢業後，由於要支持家庭經濟需要，因此在中學任職教師，晚上進修神學，在路德會協同神學院完成了道學碩士(M.Div.)(1981)，之後申請入讀東亞南神學研究院再進修神學碩士(M.Th.)。楊牧谷牧師當時在崇基學院任教，成為我的神學碩士導師。由於我日間全時間教學，未能在課堂聆聽他的講課，他花很多時間為我大部分科目作指導教授，我以個人導修方式上課，一對一，每次不少於一個小時，在他的指導之下，我完成了早期教父、巴特及杜倫斯的研習，獲益良多。經過一年多密集的閱讀，他鼓勵我繼續進修博士，並且以杜倫斯神學為研究範圍。當時我的興趣仍在中國文化與神學的匯通，神學碩士論文是「成聖與自由：王陽明與馬丁路德及祈克果的比較研究」。完成了碩士論文後，專心投入杜倫斯的閱讀。

楊牧谷是我的恩師，他原本在崇基任教，由於各種原因離開後，專心寫作。他非常勤奮，他最看不起那些拿了博士學位，不再自我增值，在大學尸位素餐的人，因此也開罪了不少人。他的釋經及神學著作洛陽紙貴，造就了不少信徒。九七前的《復和神學》更是他的力作，雖然在港台曾哄動一時，卻少有深度回應。《復和神學》好像曲高和寡，九七後更漸為人忘記。因此二千年我把它重新編訂，把論九七已經過時的言論刪除，保留了復和神學的精髓，重新出版。楊牧師可惜早逝，否則他的影響必定更大。



徐：您往倫敦大學修讀博士，師從根頓(Colin Gunton, 1941-2003)，據知有好幾位華人學者都是師從他的，可見他的思想對華人神學界有一定影響力。請問，您對根頓有什麼印象？有什麼緬懷？

楊：根頓是一位學問深厚但對學生非常細心愛護的老師。初到倫敦的時候，他因我的實況為我剪裁了最好的進修計劃，又介紹一些很有名的教授讓我旁聽增加神學知識。倫敦大學的研究學位很自由，第一年主要是讓學生自由讀書，我選修了三科，其中一科是研討班，每星期讀書最少 150 頁，要在同學前演講，壓力很大，但學了很多東西。同時期我把香港的神學碩士論文完成，得了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的神學碩士(M.Th.)。

根頓教授很耐心聽我的論文計劃，給予很多指導。一年後他推薦我為正式的博士後選人(Ph.D. Candidate)。我相信他對學生的盡心盡力使他吸引了過多的博士生追隨他，以致他的工作量非常大。

徐：您的論文是研究父母為來華宣教士的杜倫斯(T. F. Torrance)，也對田立克(Paul Tillich)有不少研究。神學碩士論文研究的王陽明，也是你在讀博士時繼續研究的。那些年，您是否期望東西兼治？或為建構本色神學努力？從做這些學問中您有何領受和體會？

楊：本來我希望繼續以王陽明及杜倫斯或田立克作比較研究，但在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學院未能找到合適的中國哲學教授，因此放棄了王陽明部分，後來集中研究杜倫斯，因為他的神學直承巴特，對華人教會有非常重要意義：是一位正統的神學家，而對神學的理性思考，及對教父遺著的研究等，都是華人教會較為欠缺的。

完成博士論文，我加倍努力繼續研讀中國哲學，以大學的老師勞思光為追隨的目標。勞老師的思辨清晰，超越前人的成就。雖然我與勞老師不算深交，但他是我的中國哲學思想指引者。我兩本有關王陽明及黃宗羲著作，都有老師的影子。

起初受了梁燕城的影響，曾想過從比較東西哲學到撰寫本色神學。後來發現本色神學並非我的興趣，因為神學不能離開聖經的啟示，我能夠做的是「基督教在中國」而非「中國基督教」，這與很多從事中國本色神學的學者路線不同。在神學院幾年，更肯定中國教會需要的是正統神學，我們是承繼上帝交付先知及使徒的教導，就是如何更接近上帝的話語，這也是二千年教會的掙扎。因此，我的寫作從比較東西哲學及宗教思想，到系統神學及教會歷史。

徐：您博士後經過多年在渥太華牧會，才返回香港在建道神學院和中國神學研究院領導神學系直至退休，再往加拿大擔任華人辦的神學院出任院長。在這些不同特色的神學院事奉中，你有



怎樣的經歷領受？尤其在華人神學教育方面認識到怎樣的情況？

楊：1986年年底，論文將近尾聲，有一日與指導教授根頓閒談，他問我畢業後有甚麼打算？我告訴他將回香港教神學。他誠懇地對我說：「Jason，從學院到學院是容易的事，但要做一個好的神學教授，你必須先牧會。」事實上根頓教授以身作則，一直是倫敦北部一間改革宗教會的主任牧師，他的話改變了我事奉的方向。我回港教學及牧會的路一直受阻，申請了中國神學研究院，但一直沒有回覆；我也應余達心牧師的囑咐、申請浸會學院的教席，因某些原因放棄了。至於返自己的宗派，因當時區會在轉折期，情況很不明朗，所以暫時擱置，只有繼續等候。

未幾，接到加拿大宣道會東及中區監督顧羅拔(Rev. Gould) 牧師的來信，說渥太華有一空缺，是否願意見見。經過慎重考慮及多次禱告，內子與我毅然到渥太華面試。二月某日嚴寒的天氣下，我們夫婦二人踏上了加拿大國土，地方陌生，沒有一位朋友，然而渥太華宣道會的熱情很快化解了我們的憂慮。

牧會八年，全是恩典，教會由我初到近二百人，到離開時六百多人，且植了三間堂會（兩間粵語一間國語）。合作的傳道同工非常同心，教會在社區也發揮了影響，例如深入華人社區的福音探訪，組織專業團契向知識份子傳福音，帶領全市教會向政府表達一男一女的傳統家庭價值。

1995年我返到建道神學院，初嘗參與中國事工，在梁家麟博士及刑福增博士帶領下，擴闊了對中國教會及中國改革開放後的認識。很短時間接到了來自北京家庭教會及大學的邀請，開始了培訓及學術交流。由於小兒健康問題，我四年後轉到中國神學研究院任神學科教授，也負責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事工，主要與中國教會及大學交往。中神周永健院長很信任及放手，讓我在十年間發展了很多與三自教會、大學及家庭的培訓，在教學及學術交流成果累累。例如：與中山大學合辦基督教思想課程，共同頒發證書；與中國人民大學合辦教牧碩士（西方基督教思想）六年，吸引全國教會領袖參加，每班超過六十人。可是新院長接任後，有其他政治考慮。

退休後 2011-17 年，我在加拿大創立了恩道華人神學院，在宣道會恩道大學(Ambrose University)體制內運作，以栽培普通話傳道為主。學生來自本土、港、台及中國大陸，不過仍是以加拿大中國移民為主。

神學教育最主要是培育上帝合用的僕人。可是有些神學院不斷追求學術而輕看了神學生的品格。另一些把嚴格的學術當作阻礙屬靈生命的成長也是不對的，因為追求卓越的學術成就也是靈命塑造的一部分。如何調適兩方面的張力，是神學教育的挑戰。神學教育不能離開教會，因此神學院與教會應保持密切合作，而神學院老師也應參與牧養的事奉，不必全時間，最少有穩



定的教會生活。

徐：您在神學院負責的教學、研究和行政等已經甚為繁忙，但你仍然長期兼任牧會工作，這是神學院全職老師很少有的，箇中有什麼原因？投入兩方面事奉對神學院老師是否很重要？

楊：我完成博士學位快將離開倫敦的時候，如上所說根頓教授鼓勵我先牧會，好像巴特及他自己，這樣神學教育才會更落實。我之後覺得牧會與教神學是不可分的，非常認同根頓所說。尤其是我的母會很有需要：我自 1963 年已返禮賢會大埔堂，在母會成長、結婚。1997 年母會雖然蓋了新堂，人數卻沒有增長。2000 年我毅然返母會，帶領教會朝向一個新的牧養。教會當時人數不足二百人，六年後已增長超過六百人；由鄉村內聚型的家庭教會轉型為天國使命福音教會。教牧同工的同心及長執的努力，是不可缺的因素。我雖然仍然擔任全時間的教學及國內事工，周院長卻同意並支持我教學以外的牧養，使我無後顧之憂，用餘下的時間帶領教會。2011 年離港赴加，教會已近一千人。

作為教會牧師，必須對所處的教區或社區有認識，對每星期來聽道的會眾有交流，這樣你預備的講章才能切實的供應他們的需要。但如此做必然花去不少時間和心力，只要你不輕看，時間總會有的。

徐：您在香港教授神學時，也協助國內的神學教育。對於國內的需要您有親身體驗，而我們建構中華神學，對於國內的神學院和教會，有哪些方面需要作合適的支援？

楊：國內的神學最重要是堅守福音派、以聖經教導為主的神學。由於國外異端不斷滲透，而國內神學院也受到自由派神學的影響。另一方面，家庭教會為了避免自由派神學，有些只抱著很狹隘的神學流派，阻礙了教會面對時代的挑戰，例如改革開放後的經濟倫理問題。至於香港的神學院及教會，在香港社運後，應避免「泛政治化」，專心做好聖經及正統神學的教導。例如《香港宣道會九七回歸信念書》（1997 年 6 月），可作為「教會非泛政治化」的參考。

該書第四段說：4.5 我們應積極關注特區政府的施政方針，以及就政府釐定政策的方針作出回應，並樂意為政府行政長官和各級官員禱告（提前 2:1-2）。4.6 我們樂意在社會福利、教育等服務上與政府繼續攜手合作，並致力開發社會服務新領域。4.7 教會繼續保持其政治中立。按照聖經的原則，教會要求政府以公義治理人民。教會同時承擔先知的職分，本着真理申述意見。

另外第三段說：3.6 教會講壇以宣講上帝的話語為己任，教會必須避免講壇流於政治化，但是教會應透過不同渠道提高會友的國民意識。3.7 各堂會不應以堂會之名義參與任何政治的集會或活動。3.8 本會傳道同工應以專心祈禱、傳道為重，在任何期間不應參加政黨或參與任何政



治競選活動。

徐：您重回香港，今後的事奉有什麼計劃呢？您對海內外華人神學工作者有什麼「忠告」呢？最後，可否談一下您神學教育以外一些個人興趣呢？

楊：我在加拿大居住前後超過二十年，對海外華人神學工作者有一些看法。海外華人神學教育以普通話為主，因此作老師應該對中國有一定認識，而且對中國人民、文化及今日的政制有溫存之心。切勿排斥、歧視及冷漠。香港文化與中國大陸很不一樣，要彼此接納、尊重。很多大陸的基督徒非常愛主、熱心傳福音，對香港基督徒來說有很多值得學習的地方。他們很渴望好的神學教育。海外的神學老師與香港的一樣，有很多機會為國內教會領袖培訓，因此，立足本土（加拿大或其他國家），放眼世界，服事中國教會。中國是如今全球基督徒最多（不少於八千萬）的國家之一。中國教會的需要仍是很大的。

我經歷四次移民，1984年去倫敦讀書，第一次移民由倫敦去渥太華牧會(1987)；第二次由渥太華返港牧會(1995)；第三次由香港去卡加里擔任神學院院長(2011)；第四次由溫哥華返港(2023)。這次返港主要是退休，回到自己土生土長的地方。這裡有母會一起成長的弟兄姊妹，也有熟悉的文化及生活。平日看自己喜歡的書，不用趕論文，不用活在死線(deadline)之下，與太太去博物館、看話劇、散步逛商場。有機會在不同教會講道，或為暫時找不到老師的神學院代課，或帶領一些造就性的講座。沒有大計劃，享受上帝所賜的「份」。這次返港雖然沒有崗位(office)，但有事工(ministries)，事主是一生的，感謝上帝的恩典仍能服事祂。